

# 历史人物考辨

余英时文集 第九卷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历史人物考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余英时文集 第九卷

© 沈志佳 编

C52  
Z13  
"V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英时文集. 第9卷, 历史人物考辨 / 余英时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4

ISBN 7-5633-5984-2

I. 余… II. 余… III. ①余英时—文集②中国—历史—研究—文集③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59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85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7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十卷本《文集》序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

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 目录

余英时文集

## 第九卷 历史人物考辨

- |    |  |
|----|--|
| 1  |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
| 21 |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                          |
| 41 | 评关于钱谦益的“诗史”研究                            |
| 55 | 中国古代思想脉络中的医学观念<br>——李建民《生命之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序 |
| 67 |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
| 89 | <b>方以智晚节考</b>                            |
| 91 | 增订版自序                                    |
| 95 | 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钱穆）                        |
| 98 | 自序                                       |

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目录**）史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上认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所拥有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遍性的，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里，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看这一心志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记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8年，在曹东文人一再鼓励之下，我重读了这些著作，并以此为基础，就某些问题作过几次较详细的讲学引论（见《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我认为这些“少

100	方以智晚节考 ——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	15
185	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 ——跋影印本所谓“黄宗羲《授书随笔》”	22
204	方以智晚节考新证	
222	方以智死节新考	50
231	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	55
260	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	98
265	方以智晚年诗文辑逸续篇（辑自《青原山志略》）	
288	重要参考资料选辑	19
297	方中通《陪诗》选抄（汪世清）	29
		89



## 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 一、历史背景——道光时代(1821~1850)的学术界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他的成学则在道光时代。我们必须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状况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才能了解曾国藩的学术渊源之所自。近人王国维说: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一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两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心之法……如龚璿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sup>[1]</sup>

王国维论道光、咸丰以降的学术新路向,因限于寿序的文体,仅举龚自珍、魏源的今文经学为代表,但他在嘉庆与道光之间截然划一学术史上的分界,则

是十分确切的。

所谓道光学术之“新”，本相对于乾嘉而言。乾嘉的经学考证以“汉学”为标榜，当时几乎有“定于一尊”的趋势。袁枚(1716~1798)说：“近今之士，竞争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sup>[2]</sup>这是亲见汉学盛世的人的证词。下及嘉庆时期，情况依然未变。满清宗室昭槱(1780~1833)在嘉庆二十年(1815)左右写的《啸亭杂录》中记载：

自于(敏中)、和(坤)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已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瑄)《读书记》(按：“记”当作“录”)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资本耳！”伤哉是言，主文衡者可不省欤？(卷十“书贾语”条)

嘉庆时北京书店竟买不到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看到这条笔记，我们是很难想象的。

汉学考证的独霸之局，进入道光时期，便开始瓦解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消极方面，乾隆时代的最后几位大师都在嘉庆年间死去了，如钱大昕死在嘉庆九年(1804)、程瑶田死在嘉庆十九年(1814)、段玉裁死在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初年，虽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尚存，阮元(1764~1849)更是经学考证的有力护法，但汉学盛极而衰，它的霸权毕竟不能维持了。最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莫过于方东树在道光六年(1826)写成《汉学商兑》一书(刊于道光十一年[1831])。方氏是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光初年，他正在广州阮元的幕府中。《汉学商兑》完稿后，他即献之阮元求教。这是一部最有系统的反汉学的著作，作者深入汉学堂奥，入室操戈，所以刊行后引起重大的反响。清末李慈铭颇为汉学辩护，但他也不能不承认方氏“颇究心经注，以淹洽称，而好与汉学为难。《汉学商兑》一书，多所弹驳，言伪而辩，一时汉学之焰，几为之熄”<sup>[3]</sup>。“汉学之焰，几为之熄”自然是一句夸大之词，但《汉学商兑》确是正式向汉学霸权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表示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在积极的一方面，新的时势对学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则不是经学考证所能满足的。乾隆一朝是清代所谓“太平盛世”。尽管乾隆晚期各种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已开始出现（如“回乱”、“川楚教匪”之类），但表面上还能维持着一种“太平”的假象。汉学考证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乾隆中叶不但足以点缀太平，而且也为整理学术传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当时许多第一流的人才愿意献身于此，也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获得了求知的乐趣、发挥了创造的精神。

但道光以后，内忧外患并发，深刻的危机感使许多读书人不复能从容治学，走经典考证的老路了。这时的知识界可以说是普遍地要求改变现状。而且这种要求早在嘉庆一朝便已见诸文字。例如，关于士大夫的风俗颓坏，洪亮吉（1746～1809）、管同（1780～1831）、沈垚（1798～1840）诸人先后都有很严厉的指责。又如对于新人才的期待，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更是万口传诵。曾国藩的《原才》之所以成为名篇，正是因为他用简练有力的古文把“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意思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如果我们不认清历史背景，便不可能真正掌握曾氏的思想渊源。

道光以下的学术精神从古典研究转为经世致用，大体上说，有两个比较显著的趋向：第一是理学的重新抬头，第二是经世之学的兴起。这两个趋向都与曾国藩的学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就第一层言，方东树向“汉学”挑战同时即为“宋学”作平反，并由此而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汉宋之争（也可称之为考证与义理之争）。但是在考证的成绩大显之后，提倡宋学的人也不能完全否定汉学的功用。所以争议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如何融汇汉宋。陈澧（1810～1882）晚年的《东塾读书记》是这一大问题的一个总结。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他曾旗帜鲜明地宣称：

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sup>[4]</sup>

在那个时代，这种斩截的态度对于理学是发生了起信的作用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就第二层说，经世之学的内容相当复杂，举凡道、咸以下的新兴学术如礼制、史学、掌故、时务（如漕运、盐法、河工、兵饷等）、边疆与域外史地等无

不与“经世”有关。即使是今文经学，名为解经，其实也是要为变法、改制提供经典的根据，其基本精神即是所谓“通经致用”。我们不妨说，道光以下的理学与经世之学是一事之两面，统一在实践这个观念之下；所不同者，理学注重个人的道德实践，经世之学则强调整体的社会、政治实践。因此在精神上，两者与乾嘉经学之为学院式的研究恰恰相反。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为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晚清经世思想出现的标志。<sup>[6]</sup>《皇朝经世文编》收录顾炎武《日知录》中有关经世实务的文字甚多，这也反映了道光时学者的一种共识。李兆洛(1769~1841)在道光初特别指出，《日知录》论时务八卷为全书精华所在。<sup>[6]</sup>同时黄汝成(1799~1837)撰《日知录集释》，也说顾氏“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sup>[7]</sup>。总之，道光以后学者推重顾炎武主要在他的“经世”之学，与乾、嘉时奉他为经学考证的开山大师大不相同。

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进修时期便受到经世学风的感染。根据他的《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收到家中寄来的一部《皇朝经世文编》，二十日他便开始阅读。这部书大概他随时携在身边，因为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也记载：“阅《经世文编》十余首。”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唐鉴要他治义理之学，但他仍念念不忘地问道：“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咸丰九年他写成著名的《圣哲画像记》，其中清代学者即首举顾炎武。他说：

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可知他所景仰的不是乾、嘉时代共奉为考证始祖的顾炎武，而是道光以下群推为经世儒宗的顾炎武。

## 二、曾国藩的成学过程

曾国藩的出身并不是所谓“诗礼世家”，他只是湖南湘乡一个半耕半读之家的子弟。他的父亲在四十三岁才考上县学的生员（秀才）。这样的身世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环境使他在中年以前接触不到当时学术的主流，因此他注定了不能走专业研究的道路。首先我要指出，湖南在乾嘉时代在学术文化上还居于落后的地位。长沙杨树达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道：

读唐仲冕《陶山文录》。陶山之学不主一家，然吾湘乾嘉间前辈能了解汉学者仅陶山及余存吾（廷灿）两人耳。<sup>[8]</sup>

可见湖南当时和乾嘉经史考证之学是相当隔绝的。湖南在学术思想上急起直追则是道光以后的事。<sup>[9]</sup>曾国藩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中年虽已中进士、入翰林院，但他的学术造诣还相当浅陋。他晚年回忆生平，有四次大耻辱，其中两次都与学问有关。据他说：

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度戊午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sup>[10]</sup>

据《年谱》（黎庶昌编），第一次是考生员，仅得备取，以“佾生”注册，这时他已二十二岁了。第二次是新皇帝（咸丰）嗣位，他上疏请恢复“逐日进讲”的制度。这是他四十岁时的事。这两次在作文和论学上所受的奇耻大辱显然给他以极深刻的刺激，所以至老不忘。

曾国藩开始认识到科举时文之外还有一个学问的世界是在他中进士、入翰林以后，他早年读四书五经也只是为了考试，谈不上“治学”两字。道光十九年，他参观了一位朋友的藏书，在《日记》上写道：“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sup>[11]</sup>以一位翰林

院庶吉士而言,他的见闻未免稍嫌寡陋了。道光二十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以后,他立意要认真读书。在受命后一个多月,他的《日记》中有一段很长的自誓之词。其警句曰: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表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

又云:

谈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sup>[12]</sup>

这里他一则曰“无失词臣体面”,再则曰“无愧词臣”,可见他深感自己的学识和他的职位(翰林院检讨)不相称。这显然是他发愤上进的动力之一。因此他在自誓以后半年内所读的书大体上是《纲鉴易知录》、古文、乐府诗、近代文集之类。

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既有自知之明,又肯虚心受师友之教,所以很快便在学问的境界上有了一次跳跃。这一发展直接起于理学的刺激。以往论及曾氏与理学的关系,学者首先必提到他的同乡前辈唐鉴(镜海,1778~1861,即唐仲冕之子),次则倭仁(卒于1871年)。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我们细读他的《日记》,便会发现最先接引他进入理学世界的不是唐鉴,也不是倭仁,而是邵懿辰(字位西,又字蕙西,1810~1861)。邵氏论学以朱子为归,但博览多通,经学造诣也很高。他不喜欢汉学,然而又不愿为门户之争。<sup>[13]</sup>《日记》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载:

邵蕙西来,谈及国朝二魏(按:魏裔介,1616~1686;魏象枢,1617~1687)、李文贞(光地)、熊孝感(赐履)、张文端(英)诸人。申初始

这都是清初所谓“理学名臣”。同月二十一日又记：

饭后走……邵蕙西处，谈及理学，邵言刘蕺山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瑄）、陆清献公（陇其）、张文端公诸集，最为醇正。自惭未见诸集，为无本也。

这两条日记最可证明最早指引曾国藩治理学的是邵懿辰。因此一个多月后，曾氏果然开始“阅薛文清《读书录》”<sup>[14]</sup>了。邵氏不但指导他读理学书，而且帮他作修身工夫。《日记》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载：

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书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在心，大恶而不知矣！

邵氏的“直”和曾氏的服善，同时跃然纸上。

曾国藩和唐鉴交往也始于同一时期，但正式问学则在次年七月。《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条云：

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平生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良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这番谈论对曾国藩以后的学术生命实有再造之功；他的治学规模就此奠定了。但若非上一年邵懿辰已引他入理学之门，他和唐鉴第一次深谈恐怕也不容易如此相契。（《日记》中记他买《朱子全集》在七月十一日，尚在向唐鉴问学前三天，这是邵氏的影响）

曾国藩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说：

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侮。……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按：道光二十年），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曾氏此处说他得益于理学，句句都是实情。他指出当时有两种风气：一是功名中人除科举以外不知世间别有所谓学问；一是汉学之士治名物训诂稍有所得便看不起讲“义理”的老辈。曾氏在读书过程中本接触不到汉学，当然不会犯第二种毛病。但他早年所受的是“功名”教育，庶吉士散馆后也只念念不忘做一个合格的“词臣”，他很有可能停留在“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的境界。所以他遇到邵懿辰、唐鉴之类的师友，“为义理所熏蒸”，确是一大转机。我们细读他的日记和家书便可发现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在精神上有过一次大转化。以宗教经验为喻，即是由苦修到皈依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资料十分丰富，此处不能详引，姑摘录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四位老弟书》中的一段如下：

吴竹如近日常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埤，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



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是以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这段话中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它进一步说明了《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所说在唐氏门下“为义理所熏蒸”的实况。现代人普遍怀疑理学的功用，而且往往以“伪道学”视之。诚然，伪道学古已多有，但不能因此否认传统儒生中曾有人真正信仰过理学。从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的《日记》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对理学的信仰是假的。也有人因为唐鉴的理学思想十分陈旧，毫无新的发明，所以连带着也看不起曾国藩的理学。其实这完全是不切题的话。唐、曾诸人只是奉程、朱的理学为修身的准则，他们并无意在心、性、理、气上另立新说。（曾氏有两篇理学文字，都是老生常谈）这正如宗教信仰不必人人都发展一套新的神学一样。

第二，信中“师友夹持”一语甚为吃紧。我们必须了解：这是在唐鉴领导下的一个理学静修的团体，他们彼此监督、互相切磋，因此而收到共同进德之效。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没有教会和专业牧师，它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一向是通过“师友夹持”的方式进行的，宋、明以来尤其如此。清代自黄宗羲等人的证人讲会以后，文社、诗社所在多有，但理学讲会早成陈迹。唐鉴、倭仁、曾国藩诸人的理学团体是一特殊的例外，其成就不是偶然的。（此团体中邵懿辰和何桂珍都以殉节著称）

第三，信中引朱子为学“须用猛火煮”之说恰可用来形容他在这三年中的精神状态。（按：《朱子语类》卷八《总论为学之方》云：“今语学问，正如煮物相似，须熬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无论是读书或修身，他此时都用的是“猛火”，表现出一种勇猛精进的气概。经过这一番“猛火煮”之后，他终于养成了恒心，从此便走上循序渐进之途了。试读他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诸弟的信：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